

邓友梅^①

地点：北京安定门外8号楼

时间：1994年11月30日



邓友梅

钟：邓先生，我得知您当年不是到日本留学，而是被骗去日本的一位中国小劳工。希望您能谈一谈当年在日本的情况。第一个问题：您当年是怎么被骗去日本的？

邓：原因倒是很简单，主要是没饭吃。

我在11岁时参加过八路

①邓友梅，当代作家。1931年生于天津。11岁时在山东参加八路军做交通员，后因年小被精简复员。13岁时流浪天津，被日本某“军管理”工厂以招工为名，“强制联行”至日本做“征用工”。1945年被遣返回国，参加新四军，自学写作，1946年起发表作品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书记处书记。

军，做交通员。到了1943年秋天，我12周岁时，延安整风，精兵减政，传到了山东，军队就将我列入弱的部分，叫我复员回家。安慰我说，好转了再找我回去。我回家不久，八路军转移了。家里叫我一个人到天津谋生，投奔亲戚。结果又没有找到亲戚，只有流落街头。我瘦小枯干，干不了重活，人家不要我；我又没有铺保，保人也不敢保，跑了人要赔钱的。我只有要饭打杂，很难过日子。这时候，就见有招工的，用的是山东一个工厂名义招工，招学徒工，日本话叫见习工。招工条件里没有要铺保，体力、文化程度都很宽大。你只要报名，愿意去，他看了合适就及格了，而且进去了马上管一顿饭。

钟：您是在街上看到广告？用中文写的？

邓：就在街上，用中文写的，白纸黑字，毛笔写的，好多地方贴着。就在一个旧式客栈的门外贴着，招工条件上写的是培养技术，培养以后能得到什么什么工人待遇。门口还摆一个桌子，有人站在旁边等着。

我走过去问能不能报名？那人说：“你这么小能干什么”？我说：“我能行”。

钟：站在门口接待的人是什么样子的？

邓：那人，是中国人。穿着绿色协和服，年约四五十岁。还有一个站在旁边，长袍短衣。

他们说：“看你挺可怜的，收你了。你填个名字”。我在一个本子上写了名字、年龄，好像还有通讯地址。我填了，就叫我到客栈里头，有人接待，一人真的发一套吃的，油条豆腐脑。里边已经有10几个人了，大家打地铺睡觉。我报了名，本来还可以回家拿行李，我没有可拿的，就住下了。

到第二天下午，有些回家取行李的人就没有来。来了几个日本军工厂的护厂队员站岗，他们是中国人。他们讲是派来维

持秩序的。当天晚上我们就上闷罐火车被拉走了，一共有二三十人。一直拉到山东淄博，距铁路线一段路，有一块地，用铁丝网圈着，里边盖有土坯房，住进去就等于关起来了。在里边开始每天上操，挖防空洞，看管得很严，每天都点名。

这是一个集中点。在火车上就讲是在山东培训。到这以后就换成日本教官了，他们通过翻译说：“你们中的一些人要到日本去培训。”这个点旁边还有几个集中点，站岗都是荷枪的，他们叫做“华北派遣军军管里新军属有限公司警备队”。实际上那时工厂还没有建立起来，是准备建立一个工厂。

有一天点名叫一些人集中，每个人发两套单的协和服（类似日本军装，五个扣子，四个兜，草绿色），两条棉毯，一个挎包，一个水壶，待遇挺不错了。还有一顶战斗帽，一双水袜子、胶鞋。这批人集中起来，穿上衣帽，绝对不许乱走了，很像集中营。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，集合做东方遥拜，向东方三鞠躬，然后做早操，学日本大东亚歌曲。老师全是日本人，不用翻译。我们上午学点日语，下午劳动挖防空洞。

一个多月后，就乘火车去青岛。到青岛又不同了，下火车直接拉到一个仓库里去，好像一个停工的纺织厂里。到这里就不许人出屋子了，连上厕所也要几个人排着队，押着去。在这里主要是检查身体，办理出国手续。在这里吃饭是每顿馒头、咸菜，同在牢里差不多。一起有几十人，当时还不感到命运有多么可怕。想跑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在去山东之前，有一个青年逃跑，被抓回来，鞭打得很厉害，大家在旁边看着，警卫几次还拿枪比着作枪毙状。

钟：这就是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。

邓：对。还有一点，去谋生的人，生活都相当困难，迫不得已不会去冒这个险。

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天不亮，叫大家打行李，到青岛很边缘的一座码头乘船。这时才发现去的人很多，不仅我们这一个点，还有其他几个点集中起来的，共有 200 多人。船是一条千多吨的装矿石船，装的是铝矾土。船有前后两个舱，中国工人全赶到舱里，上面还盖上舱盖，一直到船开出青岛，估计到了公海上，才打开舱盖，允许工人上甲板上厕所。舱里没有厕所，是在船舷上挂一个木头匣子，上厕所是很大的一项功夫，你没有见过吧？

钟：没有。我也是乘船去日本的，船上没有这样的设备。

邓：好比这是船，用木板钉一个笼子似的东西，下面横两根木板，横空的，四面也横空的，挂在船体外面。工人上厕所要跨过船舷，跳到箱子里面。这办法很古老，很可能是过去渔船上用的。

船名“千岛丸”，是他们租用的。他们好几家是把我们卖来卖去，从天津卖到山东，再卖到日本。

钟：很显然，这是模仿美国买卖黑奴的办法。

邓：对。这船从青岛到下关，要走一个星期，通过对马海峡。大家都蹲在一个舱里，我就问其他工人，他们怎么来的？这就复杂了，他们就更惨了。我们是属于招工的，他们有些是被抓来的。抓法不一，例如在济南吧，日本军队突然在某条街宣布戒严，凡是这条街上碰到的男人就一律抓走，有没有良民证的都抓。其中有一个人就很惨，他是济南邮电局一个送信的邮差，在送信时，这段街上戒严，硬是把他从自行车抓下来，扔到卡车上，就抓了劳工了，连车带信，全扔在街上了。他同我说：“我送了一辈子的信，现在就没有一个人给我家送一封信。”他已经 40 多岁，家里只有认为他失踪了。日本人是绝对不允许我们通讯的。

另外还有一部分人，是中国正面战场的战俘，可能是在湖广一带作战被俘虏的。也有个别八路军的被俘者。日本人要的是劳动力，不考虑你的历史情况，无所谓，任何人报个名字就行了。后来我知道其中有一位是后来的杭州军区政委。

钟：那你们在船上睡在哪儿？

邓：就睡在疙疙瘩瘩的铝矾土上，什么也没有。

路上吃的是岸上带的玉米面，轮流派人蒸成窝头吃。最糟的是没有淡水喝，每人只有上船时带的一小壶水，一个星期只有这一点水。最后只有用海水蒸窝头，苦得没法吃，人吃时恶心得很，又干又苦，路上就有人受不了，死了，被扔进海里去了。没有任何仪式。

日本人在船上，不再过来管我们，他们有舱房住。我们在中国见到的日本人，全是浪人，多是坏人，没几个好人。所以估计到日本没好日本过，但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同船中国人中间，有几个兵痞子，他们在中国人中间称王称霸，比如他们几个人蒸窝头时，能够霸几口水喝，反倒来欺负同胞，日本人也利用他们。

船到门司以外停下来，日本水上警察来检查，我们被叫到甲板上排队接受检查。我看见押我们来的人给水上警察行贿，把他们从中国买来的土产，一坛一坛的汾酒，两坛一个包装，叫工人抬，送给警察，还拍了许多马屁，警察才下船。

船进港，停在一个隔离地区，所有的中国人带自己行李上岸。上岸以后，叫中国人把所有衣服脱光，所有东西扔下，然后裸体排队进一间屋子，消毒洗澡，带的东西在另一间屋子高温消毒。到此，许多东西扔掉了，私人东西很少了。

检查完，就用小木船把我们载到一个孤岛的小广场上。所有的中国人站着，各个工厂就来挑人，就像奴隶市场上买卖一

样，各厂按数要，同买牛买羊一样，你要50头，就50头归你；那儿要50头，就那50头归他，连名册一起。到此，运人的那伙人就算完成任务了。这个孤岛在门司到下关之间，我如果再去还能认出来。

我在那批人，有二三十人吧，基本是原来招的一伙，就到山口县德山曹达公司。我们是坐木船去德山，住到德山市一个旧的电影院里，松竹电影院，改名兴华寮。外面用铁丝网密密围着，本来就不大，这样就更小了，仅一个小院子。每次出门，连到院子里活动，都要集体行动，就跟坐监牢一个样。电影院里已经有100多华工了，我们之后还有来的，加到一起有200多到300人这样子。电影院里两层，上面做通铺，可以住200人；下面两边也做通铺。中间池座是吃饭用的地方，售票室是日本舍监管理和看守用的地方。

开始每天拉我们到工厂去，训练一个月，拉到各个车间干零活，熟悉每一个车间工作。这个工厂有几个部分，主要生产硝酸钾、碳酸镁、硅酸曹达、类似水玻璃的东西（泡化碱）、无硼溶剂等，是军用化工原料厂。这个厂里有一个课，叫勤劳课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勤劳课不属于工厂，而是属于军队，是管我们的，是独立办公的。

我们上班是两班制，12小时一班，早上6点上班，晚上6点下班。碰上忙的时候，产量多的时候，就干彻夜，24小时，休息12小时，再干24小时。活很重。我开始在硝酸钾车间，相对来说还算轻的，工人不多。不久我就调到碳酸镁车间。碳酸镁在工序中是糊状的，像稀粥似的，漏到一个个木板上，木板通过传送带，把板插到干燥车里，干燥车再推进干燥炉里，通过很长的渠道，干燥了再推出来，粉碎装袋，就是整个车间生产过程。

我们每天三顿饭，没有工钱。一顿饭是一碗饭，很小一碗，大约二两多，一碗菜汤，有一点咸菜。如果是彻夜，打夜班再加一顿。如果不吃饭，给小小的馒头两个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所有华工吃的粮食，都是中国华北劳工协会运来的，我们是华北劳工协会卖的劳动力，不是日本本土拿粮食来养的，只是干活在日本。我们有时吃过点鱼干，是工厂在海边有管子，有时会清理出一些鱼来，吃时有非常强烈的阿母尼亚味，尿碱味，一闻眼泪都掉下来，日本人是绝对不吃的。我们平时连鱼干也吃不到，只有一点咸菜。最惨的时候，开始是一碗饭，后来饭里加白薯、加萝卜、加萝卜缨子，最后真正的米占不到三分之一了。你想，一个小碗中放三块萝卜，还有多少米？绝对吃不饱，劳动量又大，我小还稍微好一点。

我的工作就是站在皮带运输机旁边，对面也是一个小孩，是日本勤劳奉仕的小学生吧。我们高矮差不多，都在脚底下垫一个木箱子，才够得着皮带机，上面粉下来，我们用手堆整齐。这活儿简单，但要干12小时，十分累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工伤事故。最惨的还不是累，这里劳动条件等于泡在水里，地下总是水，产品总是湿的，脚跟手总是烂的，没有任何保健措施。干燥炉里又极度干，同湿来回变。这以后几十年，我的皮肤一直不好，全是坏的。

钟：您能否介绍一下，每一天从睁眼到闭眼的基本过程？

邓：哦，是这样的：早上五点起床，天从来没有亮过，大厅的铃就响了，全得起来，洗漱不会超过15分钟。然后下楼去吃饭，坐好后，由一个日本教官带领念吃饭训语，每天三顿饭全要背的，吃完了还要念一两句。早饭是一小碗粥，有一点咸菜。吃完了，各车间集合排队，由中国工人班长带队，走20—30分钟，过一条铁路，到工厂门口，自己打卡。下班把卡带回，

这卡不是发工资用的，是决定揍你不揍你用的，迟到早退就要挨揍。

进厂第一件事，是到操场集合，仍然是东方遥拜，鞠躬45度，再一分钟默念。记不清是周一还是周五，要读一次圣旨，天皇敕语。还要天天早上背社训，再做早操，然后才进各车间干活，从7点到12点。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，由宿舍送饭来，每个人一个木头饭盒，里面有饭同咸菜，筷子自己办。下班要洗澡，再走向宿舍。中国人没有工作服，也没有手套，就是在中国发的那一点东西。

那时日本也非常困难，厂里日本人多是残疾人和妇女家属，同他们自然交往中有几种情况：同我们关系最好的是女工，她们多是农村家庭妇女，对我们没有什么政治成见，比较善良。她们有的孩子也在当兵，看见你这么小就从中国来了，有些就很慈爱，还偷偷地带一点吃的给我们；再有一般日本青年工人，他们留下多半有点问题，或是病什么的。这些人文化层次很低，对中国人挺横，有一种歧视感；还有一种勤劳奉仕的学生，中学生比较多，这些学生等于义务劳动，停课服役。他们在学校接受军国主义教育，对中国人非常歧视；最为不友好的，是他们的退役兵，曾经在中国当过兵，又打过仗，他们对中国人不单歧视，态度还很坏。他们三句话不说，也没有什么理由，就打过来，从后面打过来，用棍子打，用皮带打，或者摔你，可以没有任何理由，而且绝对不许你反抗。

钟：您挨过打吗？

邓：我挨打很多次。有一次因为大家很饿，机器又正好停了不工作，大家到海边去拣一点吃的，海草、橘子皮什么的。我正在拣的时候，管理的日本工头检查，发现少了两个中国人。我正好走回去，路过办公室，路边有棵倒了的小葱，我拣起来就

吃，一边吃一边走，被那工头按住打了一顿。打完了还问我：“你还干吗？”当时日本规定，两个人以上时必须说日语，中国人同中国人之间也一样，发现中国人说中国话就有权打你。我的日语当时就只是生活中学的那一点，我也没听清楚，就随便回了一句，他更生气了，整个儿把我打蒙了。后来有个日本人告诉我，是我回答错了，那样讲就等于说是：“我还干！我还干！”

还有一次是下班回去。当时吃完晚饭还要训话，精神训话，晚上还有一次晚点名，你必须站在你的床前，然后日本人象检查监狱一样，挨个点一遍名。有一次睡到半夜，大概一点多钟，铃就响了，叫所有工人站到自己床前。因为我是住在楼上，不知楼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是那天叫白天的工人去街上拉他们配给的烟卷，给他们拉了以后，有一个中国工人在黑板上随便写了几个字，大概是“烟卷配给”，没有任何政治意义。当时舍监、勤劳课的头，就把全体中国工人喊起来了，叫白天几个去领烟卷的工人跪在前面，捱个地打他们，一定要他们说清楚：写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为了惩罚他们和大家，就把每个中国工人都捆起来，用打绑腿带，拴在双层床前。200多人，除去上夜班以外，每个中国工人都吊着，吊到3—4点钟才放下来，到5点钟叫他们上班去。就这样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打人，没有人权了！农民养头牛都会很爱护，我们连牛都不如，我们任何反抗罢工都不可能。出去全有人领着，如果你一个中国人在街上出现，任何警察都可以抓你。

工作过了一段时间，两个星期到一个月间，有一个星期日可以休息。休息时由一个日本人带着，领到有市场的那条街上，宣布从这儿到那儿一段街上允许你们活动，两个小时，逛逛大街。我们的钱很少，也没有东西可买，只有朝鲜人开的小食堂，卖代用食品，实际上是炒豆腐渣，一盘就要你2—3块日元。另

外百货公司没有什么可买的，我们买穿着是要用“点”，类似我们中国的布票、粮票，像邮票大小似的。一年一个中国人发20个“点”，一张一“点”，买一件上衣要60个“点”，你要存够三年才能买一件上衣，买帽子是7个“点”。幸运的话，星期天碰上卖烤白薯的，这要排很长的队，一个人只能买一份，大的半个，小的一个，大约二两，不要用“点”。那个百货公司是二层楼，叫作中岩。事过40年，我又去德山市，市容已经变样，但我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个百货公司，还是那个位置，还是中岩，楼则非常现代化了。

我那时小。因为待遇很坏，工人总有受工伤的，有割手指头的，有砍断骨头的，最起码是得盲肠炎的。总得有一个人往医院送饭，我小，不怕我跑了，就给我这任务。我打夜班回来，睡到十点多，就叫我起来去送饭，出去给中国病人送饭。顺便再到医院隔壁的单身日本女工宿舍，叫爱国寮，我给她们送便当去，吃完再带回来。所以我有一个人走街的机会，路过爱国寮时，等她们装饭盒时间，能够同她们聊聊天。普通女工比较善良。

我学了当地一口土话，合不合语法就不管了。我学日语是打出来的，工作时，叫你拿一个工具，听不懂就打，并不解释，打完了他自己去拿，我这才学会那是指的什么工具，下次就记住了。

在这近两年中，我在那儿生活，一个感想是：日本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坏，因为在中国看到的都是坏的日本人，而在德山那儿接触的是普通日本人。在那儿我有两个朋友，几十年的交情了。其中一人叫中元幸广，他当时是管理我们的小舍监，那时他也才十七八岁，在所有管理人员之中，他是唯一不打中国人的，跟我们比较和气，也比较讲道理。后来我问他：“为什么

对我们好？”他回答说，他小时候曾经去过中国做工，有病，被一位中国朋友留在家中看病治好，还同他讲，中日应该是好朋友。他因此很感激中国人。

还有一个是勤劳奉仕的女学生，在办公室里做化学分析。我那天为吃葱被打时，她在旁边看见了，非常不好意思。她早上碰见我，就含着泪对我说：“邓先生，真是对不起。”其实这事同她没有关系，但她觉得有愧，也使我感到普通日本人的善良。又比如我们生活很累、很饿，也有人偷偷塞点橘子给我吃。她们其实也很困难。

我们都那么穷，居然还有人来要做我们的生意。我们不是发两套衣服吗？有人来说：换你那套不破的衣服，用一碗生黄豆换。他们也惨，生活也苦。日本军方和工头，对一般日本工人比对我们略好一点，但也够粗暴的。那时日本年轻的姑娘，十八九岁，也只有一身完整的衣服，上班先去换一套破破烂烂的工作服，干活用的，下班再换回去。问那些年龄大的女工，她们好多人的儿子都在南洋打仗，没有消息。天气冷时，她们拿一些破纸袋子，用麻绳绑在腿上保暖。

钟：您所见中国工人受工伤，接受治疗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

邓：我总的感觉是，日本医院对受伤工人的态度比日本军方舍监好得多，对伤员负责，外伤医药还是有的。我在医院见到比我们还惨的，是朝鲜战俘。他们在理论上算是日本人，姓名一律改用日语。医生喊他姓名，他若听不明白，就会挨打。日本人对朝鲜人更不好。听说在工业区附近还有一个美国战俘的营地。

日本工人只是认人干活的好坏，其他就不管了。找事打人的是勤劳课的人，他们是骑自行车来检查的。有一次就问我：“你说蒋介石好还是汪精卫好？”我回答说：“这两个人我都不认

识，是你的朋友吗？”就骂我狡猾。其实我说谁好都不行。

我们宿舍曾经有三个人被日本警察抓走。其中一个人是在半夜，铃响之后，大家站在床前不许动，警察进来把他抓走的。后来打听为什么？说是他偷着给家里写了封信。弄到信封邮票并不难嘛，信一到邮局就给查出来了。还有一个工人被抓，是因为带了点书。这书是绝对跟共产主义无关，跟抗日也无关，只是一点中文材料。这些人被抓走就再也没有消息。过了几个月以后，其中有一个人放出来，住在我们旁边那个宿舍教官处，我也负责给他送饭。他被打上刑，灌凉水，已经完全不像个人样了，骨瘦如柴，什么也不敢说。日本人也不会认为他通什么情报，但就是要镇压一下中国工人。

日本人是不会睬你的学习的，但是我买过一个小本子，一支铅笔，没事就写几个字。有一次我很累，不懂事，就写了“忍耐”两个字。正在写，被勤劳课的人发现了，斥问我说：“你不满意吗？”就把本子搜走了。

我们对外面的了解，只有看包装用的废报纸。我在废报纸上看到汪精卫去世，看到日本跟德国断交，就猜测德国希特勒完蛋了。我还看过艾思奇的书《新人生观》；也看过冰心的小说。

大约一个月休息一次，能够去看一次电影。一年一次厂庆，可以休息三天，发一点食品，算是改善生活。发到我们手里，有一块豆腐，一小块鱼，再用蒜包上面皮油炸出来给你吃，叫做天芙萝，恐怕你们都没有吃过。因为没有肉给你吃，这就算是改善生活了。

到1945年春天，美国已经空袭日本本土。每天空袭，工厂无法再工作。德山市不是大市，命令要在几月几日疏散。到那一天，拉来一批军队和工人，把屋子里的人赶出来，把绳子拴在二楼柱子上。日本人的住房很简单，拉的人喊声一、二、三，

大家一用力，房子就倒了。居民也就走散了。中国工人也就没有工作了，不久就被送回中国山东，不对我们作任何解释。

钟：当时中国工人之间关系如何？

邓：中国人之间交往也少，这些人层次也复杂。也有人赌钱，用香火在竹子上烫成牌九，用来做赌具。每当干燥炉停工时，爬在里面赌。没有钱赌什么？赌饭，赌中午的一顿饭。你输了，中午这一顿饭就给别人吃。最多有人欠几十个饭，一天就只能吃一顿饭，另一顿还账。日本人看见也是打，认为你影响了工作。

另外，还有人同日本女工谈恋爱，躲在防空洞里谈情说爱，是日本女工主动的，同中国工人发生爱情。后来我们突然被押送回国，日本女工没什么可送的，就用剪刀剪一绺头发下来给他带回去。

钟：后来您第二次去日本是什么时候？

邓：我在1980年同巴金老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名义去的。我们到了日本东京，日中友好的人比较了解情况，就来问：“听说邓友梅先生在日本生活过，您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？”我说：“当然非常想去啦！”他们两个人专门陪我从广岛到德山去了一趟。我到德山，一出火车站就看见全变了，但有两个坐标我认得：一是中岩百货公司，一是德山医院。街道全变了。他们先将我领到中央新闻社，看当年的地图。我一看就知道我当年住的地方，只是原来的街全炸平了，没有恢复。

然后我们到工厂去，工厂董事长来迎接，他就说非常为当年的行为抱歉。这董事长40多岁，当年完全没有他的事。这工厂在美军占领后，以军工厂名义停顿七八年，然后改成现在的民用厂。我问：“还能不能找到当年的老工人？”他们去找来两位，不过都不是我原来车间的。说起来，当年人们已经四散。其

中有一位是女工，我问她：“你是不是住在爱国寮？”她说：“是呀，你知道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呀，我小时常去送饭。”她非常难过，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走后不久，飞机就把爱国寮炸塌了，好多女工都死在里面。”我请他们领我到工厂里面走走看看。工厂里已经变样，只有两个旧石灰炉没变，还有靠海边的车间保留做厂史教育。我的老朋友都没有见到。

我们回到广岛，停了一天，又去京都奈良。在奈良的晚上，忽然接到电话，就是我找的那位女工。她现在也是老太太了。她说有位朋友告诉她，在电视上看到我，她就专门到电视台，请他们为她再单放一次，她肯定是我，然后打听我住到哪里？问了几个地方。我则已来到奈良了，她才打电话找过来。我问她现在如何？她说她后来去了广岛，家里人都死了。现在她的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她丈夫在山口县光市，开一家建筑公司。她想来看我，但后来没有来。

我回国后，日中友协转来一封信，就是我说的那位不打人的中元幸广写来的，他听到传来的消息。他也搬了家，是当地日中友协会长。他后来专门到中国来看我，以后每隔一年来中国一趟，到语言学院学三个月中文。这么大年纪，很不容易。他是一个积极分子，张海迪去日本，他还义务去服务。

还有一位女工，在那个工厂组织一个“邓友梅先生访问团”，就是两个人，但全厂老工人都来给她们送行，挂上大标语，还照了大相片。到北京来看我，我陪她们玩了两天。她们把大相片给我，其中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。他们工厂里还成立“邓友梅小说研究会”，搞了两年，同我通讯。1984年，我再去东京，她们还来看我。

钟：您今天通过介绍，翻开了中日这两民族间沉重的一页。您今天再来看，中日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经过这样的苦难，那

么，在 21 世纪应该怎样才能共同得到发展？

邓：我在童年经历了最困难的生活，朋友也是最困难时成为朋友。当年的战争最残酷，杀了那么多人，我就是在战争中被强迫做奴隶的，但也恰恰在日本发现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也是灾难。真正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，只有少数军阀、官僚，普通老百姓没有得到任何好处。所以我现在写小说写书，看到如果仅仅把中日战争归结到两个民族之间的恩怨，感到太简单了，应该提高到人类、人道与战争是什么关系！在残酷的战争中，一度日本是战胜国，我们是战败国；又一度我们是战胜国，他们成了战败国。但是不管谁胜谁败，老百姓总是倒霉的。我在日本当劳工那一段时间，日本还算战胜国，但老百姓的日子绝对比 1960 年我们中国过的困难日子还困难得多，日本老百姓受的苦难，是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呀。我觉得共同反对战争，追求一种和平安定建设环境，这绝对不是一种政治口号，这是中日老百姓的最起码的要求。真正的老百姓，在战争中没有互相仇恨。日本一些朋友，今天生活已经相当富裕了，如果炸弹落下来，大家都一样。

钟：邓先生，您的笔能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？

邓：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，就是说战争中普通老百姓都是受害者，战争给中日民族的苦痛，不是一支笔能写完的。

再一点，我走过很多国家，美国欧洲，但我每一次经过东京，下了飞机，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中日这两个民族，文化上非常接近，有些观念相近。将来，下一个世纪，这个文化圈，万不可以为仅是有中国的儒家这种错误观念，这个东方地区是东方人共同的精神文化。

钟：现在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见解，认为东方根本不是一个儒文化圈，而是东方的国民性。

邓：这种国民性是长期文化影响造成的。可以不叫这个名字，但要承认，她们有共同的东西：她们的文化传统，她们的精神品质，她们的文化追求，包括她们的善良、谦虚、含蓄，这些特点同西方文化很不同。这并不是谁比谁强的问题，而是在这世界上，缺少了谁都不能算完美！如果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大家就有一种义务，大家携起手来，共同建设这个新世界！

钟：我听说，日本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先生，他的一个创作主题就是反战，这也是他获奖的理由之一。那么，在这世界文化格局下，您与您的笔有什么愿望要追求？能够对东方起哪种更有意义的作用？我以前拜读您的作品，留下深刻印象。我更希望在这主题下，中国作家有更好的作品问世。您对此有什么计划？

邓：我的计划是这样：现在的青年一代中国人、日本人，对过去的中日间的历史所知甚少，过分天真吧，也太容易接受有偏见人们的想法和言论。我作为过来人，有责任把我所见的真实世界，展现在他们面前。至少能够说明，中国和日本，过去是怎样走过来的。还有，他们会分辨一下，哪些东西是值得追求的，是美好的，哪些是不值得追求的。

我写的《再见了，濑户内海》，好多人写评论，有个日本人的评论说：“在我所见的日本战争小说里，最像战争。”我觉得这评论最合我意，因为我不想带任何民族偏见、政治偏见来描述当时情况。中国有句老话：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”对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是太幸福了，和平和生活保障来得太容易了。他们很容易就忘记，人类有过苦难。如果没有这个警觉的话，苦难不是不会卷土重来的，人类不是同苦难绝缘的。所以我有这一份焦虑，所以我想尽我的责任。除去政治因素，中日都需要正常发展。

钟：我有一种感觉，是他们有一个理论，认为要追求更高经济效果，为此而不择手段。

邓：他们不懂一个道理：文化、道德，可以卖钱；但再多的钱，买不来一个民族的文化、道德。一旦一个民族光有钱的话，这个民族能否在世界上挺立起来，很值得忧虑！

钟：后来您再去日本，看到中日两民族差距这样大，您有什么心情？

邓：我有两种心情：一种是看到日本人民，很快从贫苦生活中解脱出来，改善环境，我从心里为他们高兴；再一种心情，坦白地说，日本人的勤奋、他们的实干精神、他们对职业的竞争执着，是这个民族了不得的优点。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劳动一下就受表扬，当然这也应该。但在日本工厂里，一有机器问题，首先是知识分子，首先是工程师钻到机器底下去，穿着白衬衫，弄得很脏很脏。日本人是绝对动手苦干的，这样一个民族取得这样的成就，绝对不是哪几个人的事，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发扬。但是我也觉得有可悲的一点，日本年轻人正在逐渐丧失这种苦干精神。那种兢兢业业的献身精神真是越来越少。而日本民族一些不足之处，比如说蛮横、粗暴，倒是在年轻人发扬得更多了一点。

再有一点想法，日本人民生活提高了，许多人更有钱了，但我感到他们生活并不一定幸福，有钱和幸福之间不划等号。我感到他们有这么几种苦恼：一种是一旦投入经济运作后，人被经济所支配，忙得不得了，财产支配他，连想请我吃顿饭都很难，要在几天里安排。坐下来又直叹气：“我已经这把年纪了，一直被社会拉着走，什么时候我能支配一下自己命运！”这很难。再有一点，妇女常说，钱不一定给家庭带来安定感，相反是危机感。她们常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家庭，不希望丈夫很晚回

来，说不了几句话就困得抬不起头来。真有人对我讲，想过从前那种安静的日子，虽然生活上并不富裕，但一家守在一起好。

钟：您对今天中国留学生和打工仔有什么看法？

邓：我女儿在日本做外交官，希望为中日关系做一点工作。

我对这一代打工仔了解不多，听说有些人表现不好，部分年轻人太直接功利主义，就是只想捞一点什么，去就是经济目标，不择手段。我看了很痛心，同中国下海潮流是一样的。他们去也有好处，在日本这个发达国家，做任何事都要经过艰苦奋斗，他们能得到锻炼。

钟：很感谢您今天的谈话。我今天听到您讲到当年日本另一面的底层，给年轻人一种新的知识。

邓：这些在当时是常识。下班回到宿舍，常见满院子里跪满了人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？叫你跪就得跪着，也不知哪一个人在哪一个车间犯了点什么，就叫罚全体工人跪着。然后打每一个人几个嘴巴，打完才有饭吃。类似的残暴行为，讲起来没有完。你只能那么理解，那时日本军国主义思想，把人的思想扭曲了，所以他们不具备人的起码思想感情。在他们眼里，根本不把中国工人当人看，打骂人就是发泄兽性。这已不是人权问题，而是连起码的做人资格都没有。现代人很难理解了。